

CERI

长江教育研究院

Changjia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教育智库
Thinktanks

2024年01月刊

总第65期



P49 院内动态:

首届天津师范大学京津冀基础教育论坛举行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 01 中国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周洪宇

专家观点

- 22 城乡一体化办学开拓乡村教育新路径 付卫东
24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视域下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蒲蕊
36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小先生制”的历史传承与当代转换
刘来兵 任淑叶

院内动态

- 47 周洪宇院长受邀参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国际研究所 100 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
49 首届天津师范大学京津冀基础教育论坛举行
53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培养的首位博士后顺利出站
55 长江教育研究院发布 2023 年度十大教育盘点



欢迎与我们互动

中国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来源 |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1月第1期



周洪宇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

2021年3月，《求是》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强调要使我国“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

调，要“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诉求。

纵观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历史，科技和人才总是向经济实力强、文明程度高、创新因素活跃的地方荟集。实际上，无论世界科学中心，还是世界人才中心，都需要教育强有力的支撑。回顾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有关科学中心形成与转移的研究成果虽较为丰硕，但此类研究多聚焦科学中心本身，其背后的教育因素并未得到特别重视与澄清。近年来，关于世界人才中心的研究如雨后春笋，但仍有必要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关于世界教育中心转移的研究虽有愈来愈丰富之势，但经典之作寥若晨星，进言之，这类成果的“大历史观”“大教育观”意识不足，鲜有学者探究我国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未来之路。有鉴于此，笔者聚焦世界教育中心的形成与转移，透过历史视角审视潜藏在背后的规律，在揭示世界教育中心转移动力机制的基础上，探究中国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一、世界教育中心的转移轨迹及动力机制

全球教育史研究表明，探究世界教育中心的转移难以绕开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家默顿(R.K.Merton)在其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指出科学兴趣中心转移的现象。1954年，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J.D.Bernal)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描述了科学技术活动中心在世界范围内随时间转移的概貌。1962年，日本科学技术史学家汤浅光朝运用计量方法对自然科学中心转移现象进行系统研究，发现“科学活动中心转移”规律，他将重大科学成果占同期世界科学成果25%以上的国家称为“科学中心”，将科学成果保持在25%以上的时间视为“科学兴隆周期”，并据此提出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次序：意大利(1540-1610

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年之后)。学术界对“汤浅现象”早已熟悉,事实上,1974年,我国科学学先驱赵红州在《自然科学大事年表》一文中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了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现象,与汤浅光朝的研究不谋而合。世界科技中心转移情形大抵如此,世界教育中心转移情形又如何?1977年,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约瑟夫·本·戴维(Joseph Ben-David)在《世界学术中心的转移》一书中阐述了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现象,并指出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依次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此后,诸多教育学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探究,例如,姜国钧、杜晓利、王晓文、楼文军、邬大光、周光礼、朱乐平、赵婷婷等,均在研究中得出类似结论。

(一) 世界教育中心的形成与转移轨迹

世界教育中心不仅表现为因内部变革而形成的教育对国家社会科技文化的支撑力与贡献力,而且表现为外部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全球引领力。从现实表征看,世界教育中心是一国或一地区教育整体水平居于全球前列,并为其他国家或地区学习与效仿。据此,世界教育中心依次经历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这一演变路径。

1.14 - 16世纪的意大利:知识的复兴与近代高等教育的滥觞

14-16世纪,欧洲大地上兴起文艺复兴运动。这场肇始于意大利的变革是一场席卷教育、科技与文化领域的浪潮,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教育面貌,开启了欧洲历史新纪元。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与中心并非偶然。贯通东西、连结南北的地理优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创新,使意大利在中世纪的迷雾中脱颖而出。随着知识的复兴,意大利爆发科学革命的同时,迎来教育的辉煌。例如,在高等教育方面,意大利是中世纪大学的发源地,也是欧洲中世纪大学最多的地方。15世纪末,欧洲共有大学79所,其中,意大利有21所,萨莱诺大学、博洛尼

亚大学、帕多瓦大学等声誉远扬。这一时期涌现了“文坛三杰”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艺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等。在知识研究的复兴与高级学科发展的推动下，世界各地的学生慕名来此求学，一时名师辈出、智者云集，意大利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世界上教育中心。

2.17 - 18 世纪初的英国：科学之光的点亮与绅士教育的燎原之势

1688 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7-18 世纪的英国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取得较大发展。文法学校以“七艺”为主要教育内容，公学成为英国教育的风景线。在高等教育方面，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代表的英国大学倡导学院制和导师制，其课程设置在兼顾古典课程教学的同时，增加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培养造就了一批政治领袖和学术精英。17 世纪初，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F.Bacon）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命题，创建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和实验归纳的科学方法，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科学和科学教育的发展。17 世纪 60 年代，英国成立皇家学会，由此建立制度化的科学共同体。皇家学会不仅重视实验科学的探索，而且注重科学知识的交流与传播，1665 年创办的《皇家学会哲学学报》是最早发行的迄今仍存在的杂志之一。“自由主义”之父洛克（J.Locke）的教育理论被誉为反映 17 世纪时代精神、影响 18 世纪的教育思想。有学者直言，或许正是洛克教育理论倡导的绅士教育塑造了传统英国人的性格。就此意义而言，一种反映时代特征、体现民族精神的教育学理论可以重新塑造一个民族。

3.18 世纪中叶 - 19 世纪中叶的法国：思想启蒙与国家教育体制的建立

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造就了法国教育和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18 世纪大革命后，法国建立了世俗化的统一的国家教育体制。

在高等教育方面，法国出现了专门学校，并逐渐成长为法国高等教育金字塔体系的顶端——大学校，例如，巴黎理工学校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等高校在人才培养和科技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榜样。在教育思想领域，卢梭（J.J.Rousseau）发起一场哥白尼式的大革命，其教育理念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关于教育目的、教育任务和教育方法等观点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猛烈抨击压制儿童个性的等级性的封建教育制度，提出的教育理论不仅鼓舞了当时法国的新兴资产阶级，成为反教会、反封建专制的一面旗帜，而且影响了裴斯泰洛齐、康德、福禄贝尔以及杜威等一批教育家。

4.19 - 20 世纪初的德国：教育改革与现代大学的建立

近代德国的崛起很大程度得益于教育改革。18世纪末，普鲁士开始推行义务教育。1810年，洪堡（W.v.Humboldt）创办柏林大学，开现代大学之先河。柏林大学强调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注重科学研究，创建教学科研相结合的制度化组织（实验室），采用全新的教学方式（Seminar）。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成为当时德国大学超群拔萃的关键，培养了大批高质量人才。19 - 20世纪初，德国不仅出现了类似洪堡的著名教育改革实践家，而且涌现出赫尔巴特、第斯多惠、福禄贝尔等一大批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教育思想家。“科学教育学之父”赫尔巴特（J.F.Herbert）在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构建了系统完整的教育学理论体系。诺尔（H.Nohl）指出，赫尔巴特学派对教育甚至对全世界的教育作出巨大贡献，以其特有的方式维护了19世纪德意志运动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传播到海外。此外，第斯多惠（F.A.W.Diesterweg）的师范教育思想和福禄贝尔（F.W.A.Froebel）的幼儿教育思想均产生了广泛影响。

5.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学习借鉴与进步主义教育的推动

美国后来居上成为教育强国，既因其善于学习借鉴，又因其善于制度创新。在学习欧洲先进教育体系的基础上，美国创建了一套

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在其建国后较短时间内成长为世界教育中心。据统计，美国诺贝尔奖获奖人数、世界一流大学数量、国际学生数量等多项指标均居于世界前列。20世纪初期，美国基本完成初等义务教育普及任务。初级学院运动创立的教育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与发展。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到1960年，40%的适龄青年接受了高等教育。此外，20世纪前半期，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盛行，成为推动美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此期间，实用主义教育领军人物约翰·杜威(J.Dewey)建构了现代西方系统最庞大的教育理论体系，在美国教育史上开拓了一个新的时代。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迹象表明潮流再次趋向杜威的方向。

（二）世界教育中心转移的四要素动力机制

世界教育中心的转移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形成的结果。虽然不同国家因经济发展状况、社会背景及历史文化因素等呈现不同的教育图景，但其成长为世界教育中心具有较普遍的规律。总而言之，经济对教育的引领与教育对经济的推动、思想解放与理念创新、国家重视与政策支持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是影响世界教育中心形成、演进与更替最重要的要素。

1. 经济对教育的引领与教育对经济的推动

教育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果”，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通常能够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推动教育的发展，反之亦然。即教育的发展，能够给予经济发展强大的反作用力。无论意大利、英国、法国，还是德国、美国，在教育中心形成前，都有经济高速发展期。例如，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早于西欧其他国家；1588年，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逐渐成为海上霸主；20世纪初，美国的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雄厚的经济及工业基础为现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在学术界，教育对经

济的正向作用已被诸多研究证实——教育对经济增长不仅具有较高的贡献率，而且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长期的，可为经济发展提供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一国的教育愈发达，愈能为国家输送高层次人才和高水平科研成果，也愈能吸引全球高端人才，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使一国保持较为持久的繁荣。

2. 思想解放与理念创新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解放与理念创新是教育改革与发展至关重要的前提。欧洲的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为教育的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文艺复兴运动激发教育发展的灵思；宗教改革运动促进教育世俗化；启蒙运动为教育的发展肃清了思想障碍。有学者对哲学高潮转移现象进行研究后指出，从15世纪到19世纪，近代世界哲学高潮依次经历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的转移。这一转移顺序与世界教育中心转移顺序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并未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而是将各国优秀教育经验移植本土，进行高等教育理念的创新。例如，美国学术体系本身受英国大学理念和德国研究取向的强烈影响，但美国增加了社会服务概念，创建了大众化的大学体系。

3. 国家重视与政策支持

国家重视与政策支持是推动世界教育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例如，18-19世纪的法国虽然风云激荡，但国家始终重视教育。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各执政党派积极改革封建教育，先后提出《塔列兰方案》《康多塞方案》《雷佩尔提案》《多诺教育法案》等资产阶级特色教育法案。19世纪，《基佐法案》为法国初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费里法案》奠定了法国初等教育的义务化、免费化和世俗化。近代德国的教育改革之所以能实行并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1807年，施泰因就任普鲁士首相后，在推行系列经济改革措施的同时，十分重视教育改革。

洪堡就任普鲁士教育部部长后，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对德国教育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社会将教育视为一项核心社会政策，1862年颁布的《赠地法案》表明政府权力在创建现代大学中的作用。1917年颁布的《史密斯—休斯法案》使职业教育的发展获得了法律保障；1958年，美国总统批准《国防教育法》，大力推动科技教育、支持学校改进和现代化；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掀起中小学教育、继续教育及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相继出台《中小学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20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发起提高教育质量的改革。时至今日，教育依旧是美国政府开支较大的项目。2022年，美国发布《美国教育部2022-2026财政年度战略计划》（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iscal Years 2022-2026 Strategic Plan），旨在通过实施各项资助计划为个人提供优质教育。

4.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

一国能成为世界教育中心，与其教育的勃兴、科技成果的涌现、人才的聚集密不可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这一演变路径，不仅是世界教育中心转移的轨迹，而且是世界科学中心和世界人才中心的转移轨迹，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相互关联、协同发展，凸显了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究其根本，是因为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具有内在一致性。进言之，在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中，教育发挥基础性作用，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都依赖教育的支撑；科技属于动力源，一方面科技创新源于教育生产和人才创造，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带动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人才发挥主体性支撑作用，人才既是教育发展的核心要素，又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充分认识到教育、科技和人才的重要性，并有意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协同推进，为其现代化的启动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因此获得综合国力的提升。

二、何以必要：中国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必要性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发密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更需要中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中国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既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又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的重要保障。

（一）中国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宏伟目标与重要归宿

从历史脉络看，建成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夙愿，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是我国建成教育强国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关切教育事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倡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建设教育强国”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党和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矢志不渝。1983年，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40余年来，中国教育走过“拥抱世界”“融入世界”“赶超世界”“推动世界”的发展道路，中国教育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要办好中国教育，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用自主的教育经验和教育理论为世界教育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二）中国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是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踏上新征程，朝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必然要求建设教育强国、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从内部看，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

复兴，离不开教育事业的有力支撑。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提供可靠基础与重要保障。从国际局势看，当前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人才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性资源，教育是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的有力支撑，加快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目标在于从教育层面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拥有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教育实力，从而在全球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从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看，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包括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现代化，是人的素质的充分提高，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现代化与教育密切关联，人的现代化要依靠教育现代化实现。放眼全球，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先行国家无一不是通过教育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由此为国家现代化奠定基础。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不仅表明中国现代化达到一定高度，而且能够确保人的现代性全面增长。

（三）中国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是世界各国人民利益所系

教育并非单个人、单个国家的事，而是全人类的事业。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经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多边与单边、合作与对抗、公平正义与强权政治的历史考验。中国长期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同样践行和平发展道路——在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谋求自身教育发展，又以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教育发展。换言之，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尊重世界各国不同教育文化和教育传统的现代化，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不会制造阶级不平等，不会产生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杜绝任何形式的教育暴力和校园暴力，致力于打造和平和谐的教育秩序与教育新生态，这与西方国家的殖民掠夺和对外扩张的现代化道路存在本质区别。中国式教育现

代化开辟了世界教育现代化的新图景与新境界，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共享成果提供了新机遇。由此可见，中国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是世界各国人民利益所系。

三、何以可能：中国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优势与潜力

回望历史、立足当前、着眼未来，中国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有坚定的历史自信、可靠的现实基础、巨大的发展潜力。

（一）中国教育凤凰涅槃的历史基础

得益于历史文化积淀，中国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中华民族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教育的发展始终植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坚定地继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思想。首先需要澄清和明确的是，古代东方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是世界文化、教育的摇篮。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学校、最早的书籍、最早的教育家，无一不产生于古代东方。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都是古代文化教育发达的国家，对人类早期文明作出了不朽贡献。但其中三大文明古国的文化和教育都发生了中断，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中国教育历久弥新，绵延至今且更加繁荣兴旺，彰显了中国教育具有的强大生命力、适应力和更新力。

泱泱华夏，教育为本。我国早在夏代就建庠设序，到西周时期，出现“学在官府”的教育现象。春秋战国时期，创造了聚众讲学、著书立说、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教育盛世，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出现的教育专著《学记》也诞生于这一时期，“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命题是中国人重教尚学的真实写照。《论语》《劝学》等教育经典经久不衰，“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教育理念引领时代。有学者认为，唐朝时期的长安是东亚、东南亚

乃至中亚地区重要的教育中心城市，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巨大影响力和吸引力。唐朝国子监吸引了大批留学生，教育昌隆，盛极一时。儒释道碰撞交融而成的宋明理学教育思潮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其影响跨越国界，波及整个东亚文化圈。

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文明形成了诸多优良的教育传统，例如，注重立德树人、强调自我完善、倡导身家国一体、注重合一思维以及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尊师重道、孝亲敬长、慈幼严幼、庙学合一等，无一不对中国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以“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立身之本，也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精神内核。这些历经数千年淬炼而成的优良传统与优秀文化，为我国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提供了坚定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

（二）中国教育日臻雄厚的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巨大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推动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留学目的地国；已建成包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在内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等国家行列。

第一，从科技创新看，我国综合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位列全球第12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2023》指出，我国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论文数量、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及被引用次数均排世界首位。第二，从人才资源看，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人力资源大国。2022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超过600万人年，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突破3万亿元。第三，从基础教育

看，我国基础教育普及水平总体达到世界中上行列。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举办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中国成绩全球领先；上海小学数学教材入选英国卓越数学教学中心范本教材，供国外师生学习使用。第四，从高等教育看，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方阵。根据QS、泰晤士、U.S.News、软科四项排行榜数据，中国高水平大学群体实力、高等理科教育水平、高等农学教育水平、高等文科教育水平、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平均位列世界前三，位居世界前2%；此外，高等医学教育水平位居世界第四，高等教育整体水平位居世界第八。第五，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目前，我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达100%，已建成世界最大的教育资源中心，智慧高教平台用户覆盖166个国家和地区，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用户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慕课数量和学习人数均居世界第一。

虽然现阶段欧美发达国家的整体教育实力仍居世界领先地位，但随着后发国家自主能力增强，教育投入加大，教育模式创新，少数国家垄断全球优质教育资源的格局被逐渐打破。加拿大“高等教育战略联合会”（HESA）发布的《世界高等教育：机构、学生和资金》（World Higher Education：Institutions，Students and Funding）指出，全球学术重心转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向亚洲地区是大势所趋。以中国、印度等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带动全球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已经见证了中国的崛起。改革开放造就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当前，全球经济中心继续向东亚转移，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不断被塑造。伴随全球政治经济中心的不断东移和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特别是中国教育培养能力、教育发展模式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定将重回世界教育中心。

（三）中国教育重返巅峰的未来潜力

中国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具有巨大潜力。首先，中国拥有涵

盖各级各类的丰富的教育资源，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其次，中国有开放的教育环境，能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师生提供教与学的机会。再次，中国有先进的数字化技术，能够通过教育数字化让每个人拥有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最后，随着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交流合作的不断加强，未来会有更多青年来华留学和就业。

教育普及和质量提升有助于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本不断上升的新优势。有学者通过研究预测指出，到2035年，我国各类教育指标将达到OECD国家水平，其中，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将超过97%；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将超过99%；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将达到99%；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75%以上。我国人均预期受教育年限将达到极高人类发展水平，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有望提高至16.5年。伴随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将进入高层次开发阶段。有学者预测，到2035年，中国主要劳动人口中高等教育文化程度者的比例将达到35%-40%，将持续为国家发展输送创新动力。美国比较高等教育学者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Altbach）同样对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主要教育中心或研究中心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在高科技方面，中国将有一大批大学进入世界中心。概言之，中国有信心且有能力在未来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四、何以可为：中国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推进路径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学研究范式和工业生产范式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学术重心转向亚洲地区。我们要把握历史机遇，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教育强国建设战略规划，不断提升教育的支撑力、贡献力、影响力和引领力，使我国早日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一）提升教育对强国建设的支撑力

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从内部看，要提高教育综合实力，增

强教育治理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和教育服务能力等，使教育既能满足个体的成长需要、支持个体成为具有现代性的公民，又能助力科技进步、支撑强国建设。

第一，一体化建设世界教育中心、世界科学中心和世界人才中心。历史表明，世界教育中心、世界科学中心、世界人才中心三者相伴相生、相互促进，在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进程中，要统筹推进三大中心建设。亟须打破体制机制障碍，建立跨部门协作制度，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不同部门人员的流动与协作，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此外，可根据国际发展宏观形势与我国综合实力，适时酝酿并提出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世界重要人才中心的重大战略任务，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第二，加强政策引导与支持，全面提升教育治理能力。政策支持是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核心支撑与必要保障。其一，政府应继续加大教育投入，为教育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建立多元化教育经费投入机制，通过优化教育税收政策，鼓励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对教育进行捐赠和支持，促进教育多元化发展，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发展教育的强大合力。其二，健全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为教育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加快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加快修改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加快编纂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典》，制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终身学习促进法》，等等。其三，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府教育行政职能转变，简化审批服务程序，全面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

第三，加强科学教育和工程教育。科学教育是提升我国科技竞争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基础，工程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其一，加强顶层设计，为科学教育和工程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法规保障。其二，坚持核心素养导向，进一步完善科学

教育和工程教育的课程设置，优化知识结构和能力培养。其三，适度扩大理工科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加快建立以立法为基础的现代工程师制度，特别是认证注册制度，打造国际认可的认证体系，推动工程教育有力支撑强国建设。其四，进一步加强科学教育研究和工程教育研究，为科学教育和工程教育提供坚实的理论引领。

第四，加快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其一，加强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全面提升国家重点急需领域人才供给的自主可控能力。其二，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其三，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突出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增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其四，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解决好学科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间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提高学科专业支撑高质量发展能力。

第五，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一是加强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统筹管理和政策引导，建立开放、共享、协作的创新机制，促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之间的交叉融合和创新发展，共同支撑高质量终身教育体系建构，共同服务所有社会成员。二是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推动职普融通为关键、促进科教融汇为新方向，加快构建融通融合融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三是加快构建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和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工作格局，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教育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二）增强中国教育的贡献力

中华文化蕴含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兼济天下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中的基因。我国教育的贡献力不仅体现在教育对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贡献，而且外显为中国教育对世界的贡献。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需进一步增强我国教育的贡献力，推动人类文明赓续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有针对性地提升教育对国内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力，可从四方面着手。一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促进农村教育现代化，推动教育公平，扎实推进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二是优化教育结构，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三是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助力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为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四是加强就业创业教育，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和职业技能，增强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提升中国教育对全球的贡献力，一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拓展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机构的教育合作空间，助力全球教育、科技、文化事业的进步。二是彰显我国作为负责任教育大国的形象和担当，努力推动教育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三是与世界各国分享我国教育发展红利，围绕教育减贫等全球性议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为世界教育发展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四是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倡导不同文明相互尊重、交流互鉴，坚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五是建好上海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UNESCOIISTEM），推动全球 STEM 教育迈上新台阶，为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重要贡献。

（三）增强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世界教育中心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影响力和辐射力，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关键在于建立全球良好声誉、全面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畅通国内国际教育循环，以制度型开放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面向全球的教育伙伴关系，推动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第一，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在“引进来”方面，要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以开放的胸怀借鉴吸收优秀文明成果，通过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合作培养高层次人才等举措，丰富我国教育供给。在“走出去”方面，要不断扩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双边学位学历互认协议；把鲁班工坊打造成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品牌，持续扩大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优化国际中文教育全球布局，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

第二，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其一，持续深化与国际组织的教育合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助力世界可持续发展。其二，积极参与设置全球教育治理议题并进一步提高议题设置能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其三，国际标准是世界的通用语言，要深度参与相关教育国际规则、标准制定和实施，积极开展国际教育评估和调查活动。

第三，推进“留学中国”品牌建设，不断扩大中国教育的朋友圈。做好“留学中国”品牌，关键在于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和水平。其一，构建更加完整的来华留学招生政策链条、更加完善的培养管理体系，吸引世界各国优秀青年来华学习深造。其二，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严格招生审核和过程管理，完善规章制度及管理办法，稳步提升来华留学教育的质量。其三，把“留学中国”品牌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推动新时代来华留学的教育理念、发展目标、服务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和吸引力的留学目的国。

第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其一，积极宣介我国优秀教育文化，基于对中国本土历史和文化的深度理解，凝练中国教育的精神标识，展现中华优秀教育传统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其二，认真总结教育发展的中国经验、中国理论和中国模式，提炼真实反映中国教育改革的、具有

普遍价值和普遍意义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学习、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路径。其三，培养高端国际传播人才，发出中国教育声音；打造高端国际智库；提出中国教育方案；切实发挥媒介作用，提高我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第五，坚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教育对外开放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至关重要。其一，进一步提高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地位，并适时出台有关教育国际化的战略规划及相关政策，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加主动灵活的教育对外开放。其二，加大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力度，在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丰富我国境外办学形态模式，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三，进一步完善各级各类教育的对外开放，优化教育对外开放全球布局，深化中外科技人文交流。其四，进一步提高防范和化解外部风险的能力，完善教育外事管理体系，推动高水平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六，加强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确保教育对外开放方向正确和安全的底线。其一，构筑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制度，健全教育内容，完善教学机制，提升国家安全教育教学质量。其二，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大中小学一体化建设，持续提升师生国家安全意识，加快培养复合型国家安全人才。其三，丰富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资源，增强国家安全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其四，积极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实践活动，增强师生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和能力。

（四）加强中国教育的全球引领力

教育之强不是由具体事物的特性决定，而是对教育理念、思想、模式和发展道路等无形价值的反映，具有对其他国家自愿追随与模仿学习的引领示范意义。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要继续突出创新的引领驱动作用，进一步提升我国教育的全球引领力。

第一，加强教育理念创新，加快建设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原创教育理论引领世界教育。“社会科学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物，而欧洲中心主义是现代世界地缘文化的构成要素。”中国要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必须突破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必须要有基于文化主体性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加快建设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可从三方面着手。首先，注重挖掘中国教育学基因和中国教育学传统，树立学科自信与自主建构意识，结合中国教育实践提升中国教育理论的描述力、解释力及影响力。其次，将古今中外仍发挥重要作用的教育因子纳入自身视野，借鉴人类共同拥有的教育智慧，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最后，增强问题意识，应以回答新时代中国教育问题和世界前沿问题为目标，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第二，加强数字变革创新，使数字化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以教育数字化引领世界教育。当前，数字技术正迅速改变知识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与使用方式，教育数字化已成为引领教育变革的重要路径。其一，立足数字中国发展战略和教育数字化现状进行顶层设计与规划，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其二，创新数字技术，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加快缩小区域教育差距。其三，将提升数字素养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全面提升师生数字化素养和能力。其四，以数字化转型助力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建设，加快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第三，坚持守正创新，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以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引领世界教育。世界学术中心的形成离不开顶尖大学的支持，尤其是经济发展进入创新驱动阶段，高等教育已成为必要的引领性力量。其一，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全面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重塑世界高等教育版图和教育话语权。其二，把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高校要加强以质量为核心的科研创新，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要积极发挥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突出原创，产出国际化创新成果。其三，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推动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向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加速转型，加快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其四，加强高等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让教师成为中国教育故事的生动讲述者、中国教育经验的可靠传播者、中国教师品牌的有力塑造者。

五、结语

纵观世界教育中心的形成与转移，始终与一国之经济基础、政治保障、科技发展、人才队伍、文化特质等因素紧密相联。居于世界教育中心的教育强国，与其说给我们提供了值得学习的经验，不如说正是他们在教育领域作出的卓越成绩，激发我们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魄力与决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必须以长远的眼光审视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关系。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不仅助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而且为世界发展带来新机遇、新启迪与新福祉。面向未来，中国定能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付卫东

城乡一体化办学 开拓乡村教育新路径

来源 | 《中国教育报》2023 年 12 月 21 日第 2 版



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付卫东

据新华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虽紧邻城市，但农村面积超过 85%。近些年，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村生源持续减少，乡村教育面临严重空心化和资源浪费。2020 年，兰州市七里河区根据实际情况，将 26 所农村中小学和教学点进行资源整合，与城市的 51 所学校组建为数个教育集团，探索区域内城乡教育一体化办学。如今，这里的教学氛围和校园风貌已非常接近城市学校。学生们感慨：“同学变多了，老师更专业了，学习氛围浓厚了。”

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年来，我国乡村人口持续下降，城镇化快速推进，加速乡村学龄人口下降，学龄人口从乡村不断向城镇集聚。一些地方乡村学校生源大幅减少，城镇学校生源不断增加，出现了“乡村空，城镇挤”的现象，乡村偏远地区出现不少“麻雀小学”和“空

心校”，这些学校规模小、条件差、师资弱、质量低，与乡村学生高质量教育需求差距很大。针对当前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矛盾，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通过城乡教育一体化办学破解乡村教育发展的窘境，为满足乡村学生高质量教育需求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也为今后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

通过城乡教育一体化办学实现优质师资共享。和城镇学校教师相比，乡村学校教师存在结构性缺编，乡村学校教师资源配置不太合理，音体美和信息科技教师“进不来，留不住”的问题依然存在，教学点难以招聘到优秀年轻教师；乡村教师专业水平不高，难以适应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可以通过集团化办学、学区制和教师共同体等多种形式，实现城乡学校师资配置一体化。例如，实行城乡教师双向柔性流动政策，实现教师资源辐射共享；对教学点的音体美及信息科技教师，可以采取“一校设岗、多校使用、巡回走教”的办法配置教师资源；利用数字化手段，通过同步互动专递课堂、同步互动混合课堂、有组织的慕课和“双师”教学等多种模式，优化城镇学校和乡村学校教师资源配置。

通过城乡教育一体化办学让留守儿童感受到寄宿制学校的温暖。乡村教学点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长期缺乏父母陪伴，校园生活较为枯燥。将“萎缩”教学点的学生转到有专职生活教师的寄宿制学校，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带给留守儿童生活和情感陪伴的同时，也培养了留守儿童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不仅如此，寄宿制学校因“人”制宜，让监护人更多地参与低龄寄宿留守儿童的教育，可以接送他们回家，还可以参与学校课后服务。这样既满足了留守儿童高质量教育需求，也让财政资金投入更加精准、有效。

通过城乡教育一体化办学实现乡村学校课后服务质量提升。活动形式单一、师资力量短缺、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也一直是阻碍我国乡村学校课后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一方面，乡村学校可结合自身办学环境、校园文化和当地资源等独特优势，充分利用具有乡土特色的自然环境条件，开发乡土化的课后服务项目。比如，乡村学校成立以农耕文化为主题的课后服务小组，带领学生去田间观察小麦、水稻等粮食的种植和加工过程，让学生体悟粮食的来之不易。将耕读教育融入乡村学校的课后服务之中。另一方面，通过城乡教育一体化办学优势，将城区少年宫、科技馆、博物馆和青少年活动中心等资源向乡村学生开放，让城镇学校有专长的教师到乡村学校提供优质的课后服务，满足乡村学生高质量课后服务的需求。

蒲蕊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视域下教育管理 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来源 | 《中国教育报》2022年10月13日第7版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教育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蒲蕊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统筹推进明确概括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提出要“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九大本质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坚定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也为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成为问题的教育管理学知识体系

19世纪末，伴随着“西学东渐”思潮的兴起，西方的教育管理学被引入我国并促进本国教育管理学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教育管理学研究总体上依附于教育学的知识体系建构，主要是学习和引进苏联的模式与理论。此阶段的教育管理学还不能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只是把教育管理问题作为教育学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导致了教育管理学长期处于一种被冷落的状态。张济正先生将其概括为三个“基本上没有”：教育管理学基本上没有作为一门独立课程开设、教育管理学方面基本上没有公开出版过一本由我国学者撰写的论著、教育管理研究领域基本上没有形成专门的人员队伍和组织机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思想解放的日益深入，教育管理学在概念、理论、方法等方面实现了相当的积累。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应对高等师范院校教学的急需，教育管理学界诸多学者编著了一些学校管理学和教育行政学的教材，翻译了一些国外研究成果，并开始对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在多年的探索 and 实践中，学者们通过多种途径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知识体系作出了许多原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将“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作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与核心支撑。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上述重要讲话以及国家层面相关政策的颁布，对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表达中的中国主体性，重视为中国的主体性服务。教育管理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其同样需要追求并贯彻中国的主体性。正因如此，我国现阶段教育管理学知识体系建构才成为问题。

第一，中国主位意识相对不足。知识体系是学术研究的呈现，教育管理学知识体系存在的问题归根到底在于学术研究的缺陷。由于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中国主

位意识缺乏，导致了教育管理学的概念、理论、命题、研究方法运用上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当今中国教育管理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概念体系、关键议题以及理论研究的参照尺度多为“舶来品”，已有学术成果中“洋话”相对较多而“中国话”相对较少。对此，有学者指出，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起步晚、底子薄，存在过度模仿西方和借用或参照其他相关学科的倾向，加之学科边界模糊，使得该学科缺乏一定的主体性。教育管理学学术研究的“中国主位”意识相对不足，导致了西方话语依然在教育管理学话语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也使我国的教育管理学面临着“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境地。

第二，国际学术话语权不强。国际学术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是相应的学术主体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学术领域内所具有的主导性学术影响力，具体表现在引领学术发展趋势、决定学术议题设置、主导学术评价尺度、左右学术交流趋势等。从中国教育管理学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来看，虽然积累了日趋丰富的学术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并未产生或转化为广泛而持久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学术的深度交流与互鉴是学术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学术前行的重要路径。如果片面强化西方理论的规范性与期待性，误将现有的西方理论直接应用于中国情境，无疑会加深中国教育学理论的边缘化，并强化西方理论的中心地位和话语霸权。更要引起重视的问题是，价值观是文化之髓，哲学社会科学涉及价值判断，全球化、现代化、公共治理、公民社会、利益相关者等诸多理论学说无一例外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功能。因此，推进我国教育管理学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建设，不仅是打造中国特色教育管理学学科之所需，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

二、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意义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在当今国际学术界居于强势地位，主要是因为其围绕现代化的一般命题确立了一整套的理论和话语，进而垄断人类社会发展的解释权。因此，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我们加快建构教育管理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是及时回应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充分发挥教育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的学术责任和学术使命。

（一）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理论支撑

建构教育管理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理论支撑的需要。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新挑战和亟须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威胁国家安全的政治环境、‘双循环’格局的数字经济环境、‘老龄’和‘少子’两极分化的不均衡社会环境、‘卡脖子’的科技制约环境、‘多极’文化入侵的文化环境以及‘教育脱钩’的国际化环境”构成了教育发展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区域、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还存在诸多卡点和瓶颈，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层次和类型教育短板问题亟须解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原有的理论已不能完全解决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探索，提出新的理论。建构中国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适应我国未来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学说，为加快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撑。

（二）为提高教育管理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建构我国教育管理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是全面提升教育管理队伍和教育管理研究队伍现代化水平、持续提高教育管理质量的需要。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学科知识体系一旦形成，便深深渗入学术活动之中，影响着学术活动的再生产，在更广的范围内影响着社会主体即人的发展。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教育管理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高素质教育管理人才和教育管理研究队伍，而且能够持续提高政府、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教育机构的教育管理效能。

（三）为助力成功经验向理论转化提供有效路径

建构教育管理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是推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系统化教育管理学说的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做了深刻系统的阐释。遵循基本内涵和本质要求，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具有如下特征：“是满足巨大规模人口教育需求、赋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教育现代化。”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和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中国的教育发展必须走自己的路，没有教科书可依循，更没有现成答案可以借鉴。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建构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学说，彰显教育管理学的中国特色，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教育的民族性和文化性。

三、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

以主体性和原创性为本质特征的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充分体现对中国教育管理实际问题和中国教育管理经验的关照，承载着具有自身特质的知识、理论和方法。那么，要遵循什么样的逻辑来进行建构？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精神为指引，“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一）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价值逻辑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视域下的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质，又具有鲜明的世界性特质，是体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价值统一体。

一方面，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同于西方的教育管理学，应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这就意味着，我国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坚持主体性和原创性的统一。一要基于我国具体的教育管理实际，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统总结和提炼出符合中国特色并易于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推动国际学界展开学术争鸣。二要坚持人民中心、服务人民。具体来说，就是要以有效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关注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获得更大更多更好的社会效应为价值旨归，站在人民的立场审视教育管理学概念、理论、命题的生成和表达，让教育管理学的学术话语能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把握和使用。

另一方面，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视域下的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亦应追求世

界性的价值旨趣。坚持教育管理学知识体系建构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并不是封闭和盲目地排外，而是以一种开放、批判的态度，寻求与西方教育管理理论的平等对话。在主动自觉地学习和借鉴一切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的同时，通过扎根本土教育管理经验生产原创性的教育管理学知识，提出让中、西学者感兴趣的教育管理议题，多渠道传递中国教育管理学的声音，逐步确立在世界学术知识生产体系中作为教育管理学知识推进者与生产者的地位，为解决世界各国面临的教育管理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二）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逻辑

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区分的基本标志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视域下的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管理观为教育管理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根本遵循，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贯穿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全过程。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管理学是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思潮从西方引入的，尽管在20世纪初有了我国学者自行编写的教育管理学著作，但是民国时期的教育管理学依然是以向西方学习为主。改革开放初期，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建构开始总结和借鉴民国时期的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教育管理学界对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教育管理理论的引进与借鉴显著增多，不断促进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体系的完善。除了翻译出版大量的国外学者著作外，国外教育管理领域的“学校发展计划”“教育证券”“ISO国际教育标准”和企业管理领域中的“全面质量管理”“公平理论”等均融入国内教育管理研究知识体系之中。显然，教育管理学界对国外理论的引进、借鉴和研究极大推进了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体系建构。但是，理论外借同样导致“学科自身的理论基础非常薄弱，既缺乏相对的学科独立性，也难以对教育管理现实做出合理的解释与针对性的指导”，存在掩盖和弱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风险。

为防止全球化背景下可能出现的指导思想多元化和相对主义问题，2004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强调“繁荣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当然，在建构中国特色教育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不意味着不考虑时代特点和教育管理实践的现实需要，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现成话语，而是要将其提升至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教育管理问题和管理研究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改变教育管理学只问“术”而不问“道”的局面，从重视教育管理应用研究向理论研究转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管理的规律。

（三）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逻辑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坚持历史逻辑，意味着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先进文化的引领，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需要对传统的教育管理思想及已形成的教育管理学进行守正创新。

中国的教育管理实践和教育管理经验，均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沃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重视伦理关系，主张“天人合一”“以义制利”，主张在管理中塑造人性。西方哲学则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认识属性，重视个性、个人自由、个人利益和功利主义。西方的教育管理学概念、理论、命题、方法根植于西方的传统文化，带有西方的人性认识和价值取向，不加批判和反思地照搬照抄必然导致“食洋不化”或“削足适履”。与此同时，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管理学在近代传入中国并得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建设受到重视，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教育管理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为新时代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学者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管理学界创立中国特色教育管理学的的基本范式：“一是基于我国学校管理与教育行政经验凝练总结出规律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理论；二是将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教育管理理论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构建学科理论；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方法论对教育管理现象或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理论。”

因此，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视域下建构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遵循历史逻辑，认真回溯我们的历史和传统，系统审视近现代以来我国教育管理学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以民族文化的承接为基础，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养料，弘扬和挖掘文化意蕴丰盈的学科话语，充分彰显继承性和民族性。只有这样，中国教育管理学的研究成果才可能产生世界性的学术影响力，不再是各种西方思想家和教育流派的舶来品，并逐渐走向国际教育学界。

（四）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践逻辑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实践是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长点，实践性是教育管理学的鲜明特征。“离开对于实践的研究，理论不可能形成；离开实践的滋养和需求，理论不可能发展；离开实践的应用，理论没有价值，也不可能得到检验。”因此，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视域下的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仅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和力量，还需要直面鲜活生动的教育管理实践，总结时代经验，回答时代之问。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实践不只是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背景板”，其本身也为教育管理学标识概念的阐发和学理逻辑的建构提供丰富的“内容供给”。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教育管理学者开始扎根于实践、深入学校、深入课堂去发现问题、研究和解决问题，与中小学一线工作者共同推进教育实践变革。但是，教育管理理论不能充分满足实践需要、不能很好指导实践依然是一个公认的老问题。对此，有学者指出：“教育管理学者容易落入自说自话的窠臼，不仅脱离实践，‘假问题’‘假研究’很多，而且容易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显然，没有充分关照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不能系统研究当前我国教育管理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教育管理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也不能很好地对我国的教育管理实践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更无法对教育管理实践的发展做出科学的预测与判断。作为一门应用性或实践性的学科，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建设应坚持实践立场，在实践中定位自身的价值，真正重视和深入研究中国教育管理的现实，将丰富的、复杂的、鲜活的中国教育和教育管理实践作为建构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不竭源泉。

当然，坚持实践逻辑，不仅意味着教育管理理论研究者躬身躬行，关注教育管理实践，走出书斋走进教育管理一线，与教育管理实践者一起做事，而且也意味着教育管理实践者自身角色转型并积极投身教育管理研究。也就是说，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共同努力，需要提高双方的批判和改造实践的能力，构建“研究—实践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一种整体性的相互建构关系，既生成理论，又重建实践。

四、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践进路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视域下的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以学科体系建设为重点，以学术体系建设为支撑，以话语体系建设为突破。

（一）以学科发展特点为基础，建设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

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必须通过体系化、学科化的建制来实现。“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是结构化的教育管理学科的知识或理论，是教育的概念、原理和方法的体系化。”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主要路径之一，就是要对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学科归属与分类、学科性质与边界、学科知识范畴与研究方法进行系统研究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探索建构自主性学科体系。

一是要对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进行整体性省思，将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建设放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来认识。对学术发展的现状与未来进路进行整体性思考与检视是保障学术研究健康发展、富有成果的重要条件，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建设同样如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百年发展历程经历了三次大规模对先行学术、思想和文化的重新估定，每一次估定都为中国学术界构建起一个新的知识系统，并为中华文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方案。”基于此，提高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同样需要对教育管理学进行新的“重新估定”，以此来总结经验、积淀传统、聚焦问题、探索新路。

二是要着重解决现阶段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建设中的难点与堵点。首先要解决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1998年国家专业目录调整之前，教育管理学是从属于教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专业目录调整之后，与教育经济学合并为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成为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教育管理学学科归属摇摆不定，使得学术界长期对其学科归属问题存在争议，容易导致研究领域宽泛、研究边界模糊，并引发话语体系和话语表达方式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不利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实践中，大部分高校将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归入教育学系、教育科学学院等教学研究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增设了诸如教育管理学、教育管理与政策、教育政策与评价、教育发展与治理等二级学科。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梳理与澄清教育管理学与教育经济学、教育学、公共管理学和管理学之间的关系，从教育管理固有的“教育性”出发研究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设置，解决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其次要解决教育管理学重“术”轻“学”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管理学注重应用研究，而对理论研究缺乏足够关注。由此导致我国的教育管理学缺乏系统深入地研究教育管理目的、价值、管理伦理问题，对教育管理学的基本范畴和体系、教育管理学的发展历史问题也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为此，有必要深化教育管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明确学科知识体系，完善学科方法论体系和理论研究规范系统。

（二）以提高原创性和主体性为目标，建设教育管理学学术体系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视域下的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以提高原创性和主体性为目标，重视教育管理学学术体系建设。原创性的教育管理理论应是基于本国的教育管理需要与问题，研究得出的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具有独特性与创新性的理论。因此，应进一步强化教育管理理论的原创性，解决本土知识理论创新不足的问题，重视教育管理研究的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教育导向。

一是教育管理研究的重点要聚焦国家战略，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聚焦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

二是在以问题为导向的教育研究中，增强对中国教育管理经验的体认和理论自觉性，通过归纳、整理和提炼将教育管理实践中有价值的成果上升并转化为本

土化理论知识，通过理论概念创新的持续量变产生部分质变的积累中推进教育管理学理论体系发生根本性质变。

三是教育管理研究的关键底色不能忽视教育。这一学科领域研究的是教育方面的管理问题，是为了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而进行的管理。因此，需要从教育的立场、运用教育学知识理解、分析教育管理问题，厘清“教育学的教育管理学”的内涵与建设路径，并据此从整体上检视现有的教育管理学研究。同时，教育管理学学术体系建设需要坚持本土立场和系统思维。坚持本土立场，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建构学术体系不是不加判断、不加选择地移植或吸收传统教育管理思想和教育管理制度，更不是封闭排外。百余年来我们对西方教育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借鉴和吸收，并不是没有价值的。教育管理学学术体系建设不应该也不可能拒绝人类有益的教育管理思想的启发，而是要以一种开放与批判的态度自觉地学习、借鉴、评价、反思来自传统的、西方的、其他学科的教育管理思想、理论和范式，在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中，结合教育管理学学科框架和学科理论全面审视曾经接受的“外来因素”，实现“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

（三）以服务人民和扎根实践的立场，建设教育管理学话语体系

学术体系是揭示本学科研究领域的系统性理论知识，而话语体系是理论知识的表达方式，是学术体系的语言载体。教育管理学不是绝对抽象的、形而上的知识体系，而是与现实的教育实践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领域。因此，教育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重视话语体系建设，提高教育管理学知识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一是扎根教育管理实践，服务人民群众。理论源于实践，在实践中发展、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教育管理学话语体系建设应立足当下，积极挖掘和总结本土的教育实践经验，尊重特定的教育实践情境和在情境中行动的价值，致力于用个性化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教育实践，并将其纳入到教育管理学话语体系。同时，话语体系建设要坚持服务人民的立场，“说什么”以及“怎么说”要采用通俗易懂的内容与表达形式，逐渐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

二是要提升学术研究质量。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是教育管理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但是，话语体系建设绝不是简单的造词运动，有原创性的、生命力的新概念新范畴均是长期的、系统的学术探索之结晶，需要研究者平心静气、久久为功，需要自信、自觉、创新、反思、批判、使命、责任等学术精神。

三是要充分发挥知识体系的育人功能。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是扩大学科知识体系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完善教育管理学的教材体系和课程体系建设，通过政治素养、道德品质、专业知识、综合能力等方面的培育，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的优秀教育管理人才。



刘来兵 任淑叶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小先生制”的历史传承与当代转换

来源 |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23年7月第4期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陶行知国际研究中心秘书长，武汉市生活实践教育中心主任，长江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刘来兵

“小先生制”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1923年推进平民教育运动过程中形成的教学主张，是留给中国乃至世界推进教育普及实现教育公平的宝贵经验与教育遗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值此“小先生制”诞辰10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小先生制”的历史传承和当代转换加以论述。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以“新时代”为宏观背景，以马克思实践哲学、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习近平总书记实践育人重要论述为理论基础，对陶行知的“小先生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众多学校的实践中，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因培养目的明确、做法简易便行、便于广泛推行，在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爆发出了巨大能量。本文旨在厘清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变迁历程、当代价值和实践路径，以期为推动我国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贡献力量。

一、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历史溯源与现实写照

（一）基于陶行知：小先生制的原本模样

20世纪20年代初,陶行知受其长子陶宏教次子陶晓光读《平民千字课》的启发,首提“连环教学法”。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发起“上海工学团”,正式确名提出“小先生制”。“小先生制”依据“即知即传”原则,采取小孩教小孩、小孩教大人、教人去教人的方式,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长者为师”,提倡“知者为师”“能者为师”,成为普及教育的有效途径。这种强调学生主体性参与的教育方式,可谓是近现代历史上我国本土教育家重视实践育人的典型案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小先生制”焕发出了新的生命活力。自1994年始,上海市开展的“当代小先生”评选活动,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该项活动由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主办,上海市少工委办公室等承办,每年评出百名“上海市当代小先生”。近年来上海将“小先生制”扩展到“社区小先生”,在社区开展志愿公益课后托管、校外培训服务、看望照顾孤寡老人等实践活动。除此之外,中国福利会也开展了“小先生”系列活动。2009年5月23日,在中福会少年宫浦江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了浦江少儿学做当代“小先生”活动。2011年5月,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以宋庆龄故居为驻地开展时代小先生志愿讲解活动,标志着“时代小先生”计划启动,此计划旨在为少年儿童设计社会角色、搭建服务平台,使孩子们学习担当社会责任。

时至今日,陶行知先生首创的“小先生制”,“非但没有被湮没在历史洪流中,反而以‘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崭新面貌出现在公众眼前,继续为我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创机赋能”。

（二）新时代小先生：小先生制的现实关照

2017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角度强调了实践育人的重要价值。建立和完善实践育人新样态,是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

2021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少先队员们的回信中提到：“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新安旅行团’不怕艰苦，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宣传党的主张，展现了爱国奋进的精神面貌。”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新安旅行团光荣历史的肯定，也是对陶行知教育思想之“小先生制”的肯定。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肯定新安小学学陶师陶研陶，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陶行知生活教育育人思想”，践行陶行知“小先生制”，深入开展“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现阶段开展的“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作为一种新的育人方式，在其自身素养与能力上两点具体要求：一是“主动培养生活力、实践力、学习力、自主力、合作力、创造力。将‘六力’融入实践活动中”；二是“积极发扬‘即知即传’精神，坚持‘教人去教人’理念，将所学知识和能力通过语言和实践教给他人，而且鼓励其他学生也成为“小先生”，共同促进知识的推广和普及。”“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是教育工作者对陶行知“小先生制”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目前已在全国各地中小学试点推广，各校活动异彩，形式丰富，且都融生活性与实践性、自主性与创造性、公益性与教育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于一体，并通过这些特征在实践中实现育人目标。

二、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价值彰显

“小先生制”是教育家陶行知对世界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贡献，来源于普及教育的美好理想，着眼于学生发展的现实需求。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所继承和发展小先生制“即知即传”的根本原则和“教人去教人”的实施方法，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同伴协作，充分体现了其所蕴含的当代价值。

（一）以生教生：认知的投入

陶行知提出的“即知即传”的教学模式亦称“连环教学法”，“要求学生充分掌握教学知识之后能够自己当老师，将知识传授给别人，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历史经验表明，这种方法着实起到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有效兼顾后进生成长的良好效果。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继承和坚持“即知即传”的原则，将传统教育中教师直接教授学生的施受过程，转变为学生将所学知识有效内化，有目标有准备有条理地教给他人，以同龄人的语境与他人合作，共同建构经验体验的价值澄清过程。小先生在传授知识过程中获得对知识的深度学习与体悟，普通学生在同龄人语境的学习氛围和合作探讨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小先生的“以生教生”，既契合我国古代“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教学理念，也通过“以生教生”的同辈优势得以调动学生的学习激情。

（二）以生励生：榜样的身教

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的心理状态呈现出高度的敏感性，这一时期他们渴望在社交环境中获得关注与认可，同时也急切地寻求与同辈进行深刻的思想交流。这种社会认同的需求在塑造学生的个性和世界观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涌现出其优越性，它以小先生作为榜样，极力推崇和促进小先生与其他学生之间的积极互动。这一模式充分利用小先生的身教激励作用，以引导其他学生在心理和行为上更好地发展。这种互动模式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个体间的交流，更是一种对思想和道德的塑造与引导。小先生榜样示范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主要包括三方面：首先，唤醒作用。通过小先生与其他学生的同辈互动，引发了一种共鸣，激发了学生内在的道德感应，这有助于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其次，带动作用。小先生的榜样行为鼓励其他学生积极模仿和遵循，从而促使他们主动尝试与小先生的行为规范相一致，这有助于培养积极向上的社会习惯。最后，抑制作用，小先生的监督作用使得其他学生更有动力控制自身的失范行为，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的稳定性。综合而言，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模式的兴起契合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心理特点与需求，这一模式通过小先生榜样示范的三个关键作用，有助于引导学生塑造积极的社交习惯和道德观念，从而推动了教育领域的进步与发展。

（三）以生管生：民主的自治

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人是独特而自主的生命个体，拥有自身发展的主动权和内在潜能。这一理念坚信人类潜在的机体潜能可以为未来的发展提供积极的前景和广阔的可能性。在这个角度下，学生也被视为拥有权利和潜力来实施自我管理，他们具备塑造自己行为和决策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关键平台和机制，以实现自我管理，其独特之处在于将管理过程纳入了学生的视角，将学生群体的共同价值观与规范融入到个体行为中，从而实现了学生群体的内部自治。这一模式的优势不仅仅在于扩大了教师管理学生的范围，使更多的学生得以在小先生的帮助下自主进行实践，而且成功地避免了教师与学生之间因年龄差异而产生的代沟问题。通过与小先生的亲近互动，普通学生在同伴交谈中会受到情感的触动，从而唤起内在的自觉与自律，推动自身行为的积极改变。这个模式不仅使学生在道德和行为上更有自觉，还有助于建立积极的学习和社交习惯。总的来说，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模式在促进学生自我管理、培养自主性和道德发展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有助于塑造更为积极和自觉的个体，同时也增进了学校社会的和谐与秩序。

（四）以生评生：科学的反馈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通过改进学生评价的方式来优化课程实施。在此过程中，学生的主动参与使评价过程更加全面。不同于传统的“教师评学”模式，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引入了“教师评学、小先生评学和学生互评”的联合评价方式，使学生更加深度地参与到评价过程和评价体系中。这种多元评价方式的好处在于，它既避免了单一的功利性机械评价，也提高了学生自主评价的科学性和可信度。从理论上来说，小先生作为智力发展较快、逻辑思维较强的卓越学生，能够对其他学生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价。在评价方法方面，采用小先生评学可以更好地完善过程性评价。这种“以生评生”的方法可以基于他们的个体差异和实际表现，分析他们的学习状态，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学生。此外，学生还能够及时获得来自小先生的反馈，这有望提高教育质量并加强学生的参与感。“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为教育领域引入了一种更富有创新性和参与性的评价方法，从而为提高教育水平提供了潜力。

三、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实施路径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培养美好时代新人的迫切目标，是适应时代以及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为使教育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育人环节、学习行为、管理过程和学生评价等方面形成了多元化的实施措施：它将“新时代小先生”融入课堂与活动的情景中，以榜样引领的方式维系同伴协作的学习氛围，既让小先生参与班级乃至学校日常事务的管理过程中，又将小先生融入学生的评价过程中。

（一）育人环节的“师生并行”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特点之一是将小先生融入育人的各环节之中，“引导学生摆脱传统课堂的束缚、感受新时代的美好生活，走出封闭的学校、参加各种实践探究活动，彰显实践活动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方面的独特优势，使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文化自信”。这既体现在课程育人的过程中，也依托于活动育人的过程中。

首先，全面推进课程育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将课程育人和“小先生育人”相结合，不仅能创新课程建设的路径，也能强化小先生的育人功能。在课程育人中，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结合各个学校自身情况，充分挖掘学校学科资源，积极发挥课堂的主阵地作用，突破课堂与实践相对立的问题，在学科课堂创造性开展各项学科教学活动。例如在“小先生开讲啦”的数学课堂中，小先生通过一连串有趣的问题带领同学感受“身体尺”的神奇，他用自己的小手、小脚作“尺子”准确测量教室里的物体，还推荐了绘本《我家漂亮的尺子》等一连串的操作让同学们沉浸在数学的海洋里。“小先生开讲”不仅仅是一个外挂于课堂教学、训练表达能力的演讲活动，更有机嵌入学科教学全流程各环节，保证了活动的实效性和长效性。从大先生的角度来说，学校依托课前三分钟开讲启动了教学新机制，因为“小先生开讲”已经自然地进入到教师的备课设计中，教师备课时会思考：其一，教学过程中哪些内容适合学生讲、哪些环节需要学生讲，或者哪些环节学生讲比老师讲教学效果更好；其二，既然教学中的一些环节由小先生参与并主讲，那么备课时需师生合作，探讨如何让学生紧密地融入教学设计中，这就调动了教

师对课堂的深度思考和学生对课堂的深度参与。其次，在活动育人过程中，通过让小先生从“学生”身份转变为“教师”身份，重新定义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角色动态。这种转变不仅扩展了学生的活动经验，也有助于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但必须明确的是，让学生担任“教师”，并不是完全放任其自由开展活动，在学生“教人”之前，教师的“教人”环节不可缺少。教师在预先学习和准备活动的过程中，需要教会小先生们如何撰写教案，帮助其掌握撰写教案和开展活动的的能力。以“新时代环保小先生”活动为例，小先生在进行活动教学之前，教师提前对即将讲解的知识进行审定和调整，确保其内容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在小先生进行知识讲解的过程中，教师则从旁引导其他学生进行回答，或帮助小先生顺利推进活动内容，以此来帮助其更好地进行经验总结和知识传递。因此，小先生活动方式的成功实施需要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紧密协作。教师的角色不仅是知识传授者，还是“教人去教人”的导师。通过这种合作，教育能够更全面地培养学生的能力，使他们更好地迎接未来的挑战。

（二）学习行为的“榜样示范”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重视生活力、实践力、学习力、自主力、合作力和创造力的发展，力求培养小先生成为五育并举的时代新人。小先生是“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核心力量，通过让学生争当小先生，既可以让学生参与到教的过程之中，发挥同伴之间的互教互学作用，也可以为他人做出榜样示范。为此，不同的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实验设计了各异的激励措施，促进小先生的“榜样引领”，从而维系“即知即传”的同伴协作氛围。

一是精神激励取向，通过“晋升体系”树立榜样。多数学校最初意图通过开展新时代小先生行动改变课堂单一的“教师教”的沉闷气氛，提高学习的趣味性。随着行动的开展，“识字小先生”“阅读小先生”“护眼小先生”“文明小先生”“预习小先生”等逐渐发展起来，学生们开始真正成为课堂的主角，发挥同伴之间的引领示范作用。由此可以发现，这一类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学校在行为规范上通常以“榜样引领”的方式激励普通学生主动积极地模仿，继而塑造普通学生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范式。当然，小先生的“榜样引领”作用绝非偶然形成，也需要新

时代小先生行动学校实施一定的激励措施。这一类“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学校秉持精神激励取向的原则，鼓励小先生的“榜样引领”，为他们构建了晋升体系，以激励其责任感与荣誉感。除了教师的直接任命小先生，当普通学生在某方面的表现超过现任小先生时，他也可以申请荣升为新的小先生。所以，他们不仅是为成绩高低而竞争，更是为荣誉而奋斗。小先生的任职时间越长，在普通学生中的威信也就越高，就越能获得普通学生的依从和效仿。相反，小先生也会为了提升普通学生对自己的认可程度而不断努力规范自己，寻求晋升，成为学生中的榜样。

二是物质奖励取向，通过“业绩挂钩”促进协作。小先生与其他学生既是同学关系，也是“师生”关系，这种“双重关系”的维系既需要小先生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又需要其他学生的积极配合。“双重关系”的核心人物在于小先生，小先生能否被激励得当也决定其能力发挥的限度。物质奖励取向的学校，通常通过小先生的教学成绩与其他学生学业成绩挂钩的方式，维系“双重关系”。在此类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学校里，小先生的奖励依据是建立在其自我能力提升和指导其他学生进步的基础之上。被帮助的学生可以获得琳琅满目的奖品作为奖励，例如“阅读优秀”“写字优秀”等各种奖章，或者获得陀螺、风筝、书籍甚至银表等丰富多样的奖品。小先生作为该生的学习帮扶者，也有权获得同样的奖励，以激励小先生继续帮助其他学生，更好地落实“教人去教人”的原则。

（三）管理过程的“层级分明”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基于管理育人维度，保障学校在保证治理现代化下治理体系工作的落实，并贯穿于学校管理制度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教师是管理者，学生是被管理者，但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主张的则是一种自主自律的管理模式，可以让更多的同学加入班级管理当中，锻炼自我管理能力。这就在班集体中创设了一种人人管人、人人被管、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的良好氛围，再进一步从中培养班级管理骨干，逐渐实现班级的自我管理。例如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实验校成立了“六微评价”环保实验班，班级单独成立了一只环保管理干部。这只环保管理队伍由三级组织构成，一级是班级干部，班级干部设置五名，叫作环保班长，每天一名负责班级卫生人员的安排、环境、

工具的检查与维护，桌椅的摆放与“六微评价”环保章的发放。二级是小组干部，称为环保组长，班级按照“六微评价”分成了八个小组，每个小组大约七人，每个小组一名小组长，负责检查组内成员的日常卫生行规，并做好记载。三级是环保卫士，班级管理做到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每个学生都是环保小卫士负责监督同桌的卫生情况及座位周边情况。当天在环保检查中无违章现象加一枚表扬章，表现优秀由小组长推举加两枚表扬章，环保检查不合格者发放一枚加油章。完善环保管理干部后利用班会制定详细的小干部职责，环保细则等。环保小干部依章行事，各司其职，环保卫士们依章互相监督，由此形成了学生自我教育、民主管理的班级管理模式。

（四）学生评价的“多元参与”

只有“正确运用教育评价这一风向标和方向舵，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导向作用，建构健康的、科学的、合理的教育评价体系，保证各级各类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鉴于学生同伴之间的了解程度，让小先生渗透在学生的日常评价过程中成为了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实施的一个亮点，也为科学评价普通学生提供了一种思路。在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实施过程中，部分学校仅让小先生们参与智育评价的过程，也有一些学校则开始让小先生们融入德育评价的过程。

一是让小先生参与智育评价。多数学校更为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和知识掌握程度，故在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实施过程中，这些学校将小先生纳入到评价主体中，借助小先生与普通学生的交互关系实施对普通学生的学业评价，也在评价普通学生的过程中充分吸取小先生的意见和看法。可以说，小先生在对普通学生的评价、特别是过程性评价中承担着重要职能。小先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监督普通学生的日常学习动态，如对学生进行读书监督等，负责对普通学生每天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估和考核。同时，小先生也是教师的助手，一方面负责维护班级秩序以及担负查听全班同学背诵课文等方面常规性事务，另一方面又及时准确地将普通学生的动态信息和学习效果反馈给教师，帮助教师做出教学决策与评价。

二是将小先生融入德育评价。互动式评价“强调评价本身是一个多元主体的互动、对话过程。德育评价需要充分发挥教师、学生、家长乃至社区等多元主体

的评价作用,引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对儿童道德发展的评价”。“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突破传统的评价方式,将学生作为德育评价的主体,对儿童的整体道德生活及行为表现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价。在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中,小先生们可以通过自我评价、制定发展计划、参与道德讨论和社区参与以及参与评价过程,积极参与到德育评价中,发挥关键主体作用,以此促进他们的道德成长。

（五）学习资源的“三者合一”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统筹学校、家庭、社会三种资源,积极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育人新格局。

一是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是重构育人模式、推进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根本前提。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在开展过程中坚持以学校为主体,协同家庭、社会开展实践育人活动。首先,发掘各学校的独特资源和优势,推动学科课程建设、教学方式、教育理念、师资力量、环境氛围、校训班规、硬件设施等方面的提升,结合学校教育传统和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任务类型进行适时调整,以培养高质量的“新时代小先生”为核心增添本校办学特色。其次,设计开发“新时代小先生”课程体系,将“新时代小先生”融入学科课堂教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校园文化氛围等。例如将新时代小先生行动融入课程德育,开发出“一班一特色,新时代小先生”课程体系。第三,形成一批“新时代小先生”教材,为开展小先生活动提供教材资源。

二是发挥家庭教育的独特优势。在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实施过程中,家庭积极支持与引导学生参与各项活动,发挥其独特育人作用。例如在阅读活动中,家长在活动开展前协助小先生们学习相关知识,活动开展时家长与学生进行亲子阅读,让小先生们在各班家长会上进行阅读分享,使家校协同共育深入发展,家长积极支持、引导、陪伴学生参与活动,让学生在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中树立远大志向、培育美好心灵。除此之外,

各行各业的家长资源的充分利用,可以使学生实践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学生通过体验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特点,形成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初步认识,激发当下发展兴趣和提高学习的动机。

三是整合社会教育的优质资源。新时代小先生行动通过和政府行政部门、共青团和各类公益基金会、社会福利组织搭建活动平台，通过抓住关键时间节点和节假日，在各类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启动仪式上发布宣言和倡议，鼓励“新时代小先生”走进社工站、街道或居委会、救助站、福利院、书店等社区服务站点，主动参加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利用历史遗址、革命传统文化、军事国防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文化馆等科普教育基地，山林、草场、湿地等生态教育基地开展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当前新时代小先生行动仍然处于不断探索阶段，基础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应试教育注重“分数本位”、“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等实践命题亟需教学组织形式的革新。通过对陶行知“小先生制”发展概况和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实施特征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新时代小先生行动的认识，对我国当前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立足新时代，概览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已取得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效益，综合当前实践育人的现实图景，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将继续指向探索和建构基础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样态。



周洪宇院长受邀参加哥伦比亚大学 教育学院国际研究所 100 周年纪念 学术研讨会

2023年12月8日9时(北京时间8日22时),“‘教育系全球,福慧遍五洲’——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国际研究所10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召开,我院院长周洪宇教授受邀以线上方式为作《陶行知与孟禄及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国际研究所》专题报告。

周洪宇院长从“陶行知其人其事其说”“陶行知与孟禄、斯泰尔、杜威、克伯屈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陶行知等留美同学与哥大教育学院国际研究所”三方面系统论述了陶行知与孟禄及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国际研究所之间的关系。

他首先强调了陶行知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陶行知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教育改革的主将之一,同时也是中美教育文化合作与交流的先驱。陶行知与孟禄及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和国际研究所的故事是20世纪中美教育交流史和中国教育现代化史的一段美丽的佳话。

周洪宇院长进一步指出,杜威、孟禄等美国教育家20世纪的来华及其思想传播得益于陶行知、郭秉文、胡适、蒋梦麟等哥大中国同学的邀请与协助,他们在华的活动与经验也丰富与滋养了自己的思想与事业,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这些中美教育交流相关者都为20世纪上半叶中美教育交流和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并为今天中美教育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重要启示。

周洪宇院长强调,作为这些教育前辈及其事业的后继者,我们要格外珍惜这种历史情缘,做中美教育交流的促进者、实践者、推动者。我深信,文明互鉴,相互取法,“两泽相丽,互为滋益”。21世纪中美教育交流必将促使合作共建,从而达到更高的高度。中美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也一定能够在新时代孕育出更加绚丽的成果!

据悉，此次会议由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先生、世界知名教育经济学家 Henry Levin 教授、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许美德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第十一任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领事馆总领事黄屏、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学术副院长、教务长 KerryAnn O'Meara 作开幕致辞。来自哥伦比亚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美协进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全球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与会。



首届天津师范大学京津冀基础教育论坛举行



12月16日，由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指导，天津师范大学和长江教育研究院主办的首届天津师范大学京津冀基础教育论坛暨第三届“天津·长江教育论坛”在学校京津冀教师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举行。论坛主题为“教育强国背景下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致辞并作主题报告，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郝奎刚出席并讲话。天津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曲凯致辞，副校长佟德志主持开幕式。来自京津冀高校专家学者，区县教育局领导，中小学校校长、教师以及天津师范大学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等近100名教育同仁参加论坛。



周洪宇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天津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论坛已连续举办十届，今年升格为京津冀基础教育论坛，成为深入研讨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动向、推进方略，探索教育实践和经验案例，落实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为京津冀基础教育领域的管理者、研究者和实践者搭建平等对话、经验分享、资源互补、合作交流的高端平台。

郝奎刚向出席论坛的各位专家、来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天津以高质量建设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国家实验区为契机，下实功、出实招、见实效，持续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他指出，天津师范大学始终坚持“强师强教”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助推区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用行动彰显了大学的社会责任。他希望与会专家广开言路，汇聚智慧，多为天津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共同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曲凯指出，天津师范大学积极落实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战略，在促进京津冀三地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校际合作交流、教师发展协同创新等方面凸显了责任担当。

在本届论坛中，京津冀三地同题共答、同向而行，必将合力推动京津冀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同心协力把京津冀三地教育建设的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践，合力打造基础教育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新模式、新样本、新高地。

论坛开幕式期间举行了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改革实验区“生活·实践”教育实验学校授牌仪式和共建合作签约仪式。天津师范大学滨海附属学校、天津师范大学滨海附属小学、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腰站中学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第三小学荣获授牌。

天津师范大学、河北省承德市教育局、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教育和体育局签订共建合作协议。三方将以教师教育改革实验区建设为纽带，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新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要求，集聚创新资源、做强教育共同体、推进深度融合发展，携手绘就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在主题报告环节，周洪宇教授作了题为《弘扬教育家精神 做行知式大先生》的主题报告，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小学教育研



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博士生导师王本陆教授作了《课程育人的路径探讨》的主题报告，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申国昌教授作了《从陶行知看教育家精神》的主题报告。

高端对话环节由京津冀教育局长高端对话、京津冀中小学校长高端对话两个环节组成。天津市滨海新区教育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方华，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明建平，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康学敏，北京市丰台区委教工委委员、丰台区教委副主任翟洪臣交流三地教师队伍建设经验。河北省雄安新区雄县中学校长李友良、天津第二中学校长高欣、天津市新华中学党委书记陶扬、清华附中大兴学校副校长张月英交流了京津冀三地人工智能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方面的经验。

在市教育两委的关心和指导下，天津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论坛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已成为传播党和国家教育政策、研讨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展示先进教育教学成果的交流平台。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促进京津冀基础教育高质量协同发展，学校将本次论坛提升为京津冀基础教育论坛，推动京津冀三地基础教育经验交流，提升天津基础教育在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影响力，为国家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



省级教育智库联盟动态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培养的首位博
士后顺利出站

12月11日，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全晓洁博士后出站报告会在状元府306会议室召开。评议专家组组长深圳大学教育学部主任靳玉乐教授，评议专家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蔡其勇教授、西南大学社科处处长王牧华教授、西南大学西南民族中心主任张学敏教授、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罗生全教授参加出站报告评议会。组织人事处处长赵仕民研究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参会。

报告会上，全晓洁博士后围绕“乡村教师文化回应性教育能力及提升路径研究”做主题汇报，合作导师蔡其勇院长介绍了全晓洁博士后在站期间的研究工作表现、科研工作情况及取得的科研成果。评议专家对全晓洁博士后的研究能力和工作成效表示充分肯定，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其完全达到博士后出站要求，最终评议结果为“优秀”。

全晓洁博士后是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培养的首位博士后，在站期间，她与合作导师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中国教育学刊》等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5 篇，主持国家级课题 1 项、省部级课题 4 项、市级教学改革项目 1 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 1 部，获得重庆市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1 项，获得重庆市巴渝学者青年学者荣誉称号。



长江教育研究院发布 《2023年度十大教育盘点》

十大教育新闻



2023年度十大教育新闻

1. 《习近平：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求是》杂志）
2. 《习近平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强调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新华社）
3. 《孙春兰出席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新华社）
4. 《爱国主义教育法表决通过 自明年元旦起施行》（新华社）
5. 《全面构建协同育人新格局——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就〈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答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6. 《三部门发文聚焦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光明日报）
7. 《组织高水平高校培养高素质中小学教师人才——教育部印发〈关于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8. 《搭建老有所为平台 助力教育强国建设——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9. 《教育部召开全国“双减”工作推进会暨“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1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在华设立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的决议》（新华社）

长江教育研究院发布 《2023年度十大教育盘点》

十大教育热词



2023 年度十大教育热词

1. 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
2. 弘扬教育家精神
3. 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4. 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
5. 持续推进“双减”
6.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7. 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
8.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
9. 实施“国优计划”
10. 规范应用 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

长江教育研究院发布 《2023年度十大教育盘点》

十大教育政策



2023 年度十大教育政策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的致信中强调：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3.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以公益普惠和优质均衡为基本方向，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水平
4. 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

意见》：切实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建设，营造良好育人生态

5.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更新教育理念转变人才培养方式，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

6.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

7. 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全面提升中小学生学习科学素质

8. 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建设与管理的意见》：强化中小学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建设与管理，提升课程育人功能

9. 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深入挖掘老龄社会潜能，推动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

10.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加快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长江教育研究院发布 《2023年度十大教育盘点》

十大教育图书



2023 年度十大教育图书

1. 《做中国教育的建设者：新教育实验二十年》
2. 《我与陶行知研究》
3. 《教育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区块链和机器人技术如何赋能》
4.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评传》（共三卷）
5. 《民办高校治理现代化研究丛书》（全5册）
6. 《全学科阅读：创建一所图书馆式学校》
7. 《好的关系 好的教育》

8. 《当代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新进展（2010——2020）》
9. 《有“我”的教育学》
10. 《中国师范教育发展史》

2023 年度十大教育图书提名

1. 《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
2. 《什么是好大学》
3. 《院校研究与院校管理》
4. 《教育根本是唤醒人性——法国教育家蒙田谈教育》
5. 《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
6. 《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
7. 《教育的根本》
8. 《我的幼儿教育故事》
9. 《大学，有什么用》
10. 《为什么你的学生不思考》

长江教育研究院是在湖北省教育厅的支持下，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起，于2006年12月16日成立的教育研究机构。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03-2023），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担任院长。

长江教育研究院本着“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的指导思想，“民间立场、建设态度、专业视野”的立院原则，聚集了一批国内外优质教育专家资源，搭建了一个以文化出版企业为依托、联系相关教育专家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平台，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政策研究为重点、出版企业为依托、政府支持和社会参与为支撑，“学、研、产、政、社”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的新型体制机制。

16多年来，长江教育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打造新型教育智库“重器”，努力让智库的“谋划”转化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智库的“方案”转化为实际行动，智库的“言论”转化为社会共识，更好地为改革奉献力量。自2016年来，连续三年在中国智库索引评选中社会智库类排名稳扎前三。2017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2017年度中国核心智库”。



联系电话：027-87671389

官方邮箱：cjy2006@cjy.com.cn

官网地址：<http://cjy.com.cn/>

公司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268号省出版文化城B座6楼